

● 哲 学

现代宗教人类学的方法

宫 哲 兵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宫哲兵(1949-),男,山东蓬莱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宗教学和人类学的研究。

[摘 要] 宗教人类学具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文化相对论的方法等。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研究方法得到发展和更新。适应新的研究对象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如对宗教变迁及其动力的动态研究方法、对社会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客观方法与主观方法的辩证把握等等。

[关键词] 宗教学;人类学;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B 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5-0655-05

宗教人类学是宗教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的宗教人类学,主要研究未开化民族的原始宗教。现代的宗教人类学,既研究未开化民族的原始宗教,也研究文明国家和发达社会的宗教;既研究普化的民间宗教,也研究制度化的民族宗教、世界宗教。宗教人类学具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文化相对论的方法等。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研究方法得到发展和更新。适应新的研究对象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如对宗教变迁及其动力的动态研究方法、对社会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客观方法与主观方法的辩证把握等等。

一、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

(一)田野调查的独特性

当宗教人类学以文明国家和发达社会的宗教为研究对象时,它与宗教社会学有许多重合之处,但它的方法与宗教社会学的方法有鲜明的不同。宗教社会学的典型方法是问卷和统计,宗教人类学的典型方法是田野调查。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说,田野调查工作之于人类学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样。例如,信徒为什么会信仰宗教?对于这个问题,宗教社会学家的主要方法是设计问卷、发出问卷、收回问卷,在电脑上统计和分析问卷。由此得出信徒信仰宗教有 ABCD 四类动机或原因,他们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占多少比例,他们的文化程度、家庭状况与信仰宗教的

关系等等。宗教人类学家则会深入到一个社区,住在一些信徒的家里,了解这里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情况。他们与信徒一起生活、谈心,与信徒一起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与信徒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等等。几个月或一年下来,他们对于这个社区信徒们的生活、心理、各类活动不但是如指掌,而且有亲身体会。宗教社会学的优点是掌握宏观、整体;缺点是用预先制定的问卷调查,往往只能发现制定者想要发现的東西。宗教人类学的缺点是局限性,优点是个案材料丰富,思路开放,调查时会发现许多预想不到的收获。所以,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说,人类学家经常依靠直觉和预感。

(二)参与观察的重要性

很多学科都提倡实际调查,宗教人类学的调查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要求参与观察。这种方法要求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长期生活在一起,甚至忘记自己是调查者,认为自己是被调查者中的一个成员。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像他们一样去信仰,去祭祀,去喜怒哀乐,要达到“浸润”到一个民族之中的状态。美国人类学家 R. M. 基辛说:“实地考察是一种深入的洞察。当一个人投身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之中时,他就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透视自己,透视自己的生活方式,透视人性。实地考察是一种深刻的经验,很不舒服,有时甚至令人精神崩溃,但收获却很丰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浸润在一个民族之中。人类学家并不研究人类的大量的样本,而是尽可能地进入人类的一个小型群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个小型群体将成为整体的一个缩影。人类学家学习他们的语言并尽力学习

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学习是通过参与观察来进行的,即一边观察新的生活模式,一边也以此模式生活”^[1](第 16-17 页)。宗教人类学家往往会说多种语言。如对东南亚民族的宗教仪式很有研究的法国教授雅克·勒穆瓦纳,会说法语、英语、汉语、泰语、瑶语等近十种语言。每研究一个民族的宗教,他就要学习这个民族的语言。因为不会语言,就无法进行参与观察。当宗教人类学家完全浸润到一个民族的生活中以后,有时会与该民族的姑娘发生感情而生活在一起,使自己真正成为该民族的一个成员。雅克·勒穆瓦纳在泰国做田野调查时便娶了一个泰国姑娘为妻。有人以为宗教人类学家是国际旅行家,不仅可以观赏各民族的宗教生活与奇风异俗,还可以与各个民族的姑娘谈情说爱,生活似乎又潇洒又浪漫。其实,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的艰苦性、复杂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

(三)田野调查的艰苦性、复杂性

宗教人类学家初到一个偏僻的社区,会经历“文化震撼”——对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习俗感到强烈不适应。下面是人类学家查格农在南美雅诺玛莫族做田野调查的一段日记:“我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大汗淋漓,小蚊叮咬,全身涂满了红色颜料,这是那许多强悍的印地安人对我进行十几次彻底检查所留下的痕迹。这些检查总算结束了严酷的一天。那些印地安人把鼻涕擤到手上,手腕一甩就掉了,再把剩下的揩在头发上,接着就检查我的脸、手、腿、头发以及衣袋里装的东西”^[1](第 23-24 页)。显然,印地安人的生活习俗与西方人有很大的差距。另外,因不同文化引起的误解、猜疑、敌意也导致情绪低落。如当地人认为你的某句话、某个动作侮辱了他,你百般解释却往往误解更深。一个人独处异乡会被孤独和不安全感所折磨,只有马不停蹄的工作才能暂时忘记这种折磨。

艰苦的调查才有厚重的收获。1985 年,笔者带着几个学生在湖南凤凰县调查苗族打棒棒猪的宗教活动,工作从下午 4 时到第二天上午 10 时。我们参与其间,不停地观察、拍照、询问、记录,了解每个仪式的象征意义,一天一夜不能睡觉。两年以后,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作学术报告“苗族打棒棒猪习俗的社会历史透视”^[2](第 119 页),介绍了自己对打棒棒猪活动的调查与研究。会上美国苗人说,他们至今有打棒棒鼠的宗教活动,时间安排、仪式程序、象征意义与中国苗人打棒棒猪基本相同。这一方面说明美国苗人继承了中国苗人的宗教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族迁徙带来的宗教变迁。

二、比较的方法

宗教人类学家在一个民族的村子里,居住一年至数年。田野调查使他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难道调查的目的就仅仅是为了知道这个村子里的奇风异俗吗?不是的,而是希望通过一个村子去探讨这个民族的宗教,通过这个民族而探讨这个地区的宗教。这就决定了在田野调查之后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去寻找几种宗教相同和相异的地方。

(一)两种宗教比较研究

早期西方的宗教比较研究,目的是为犹太——基督教体

系的宗教统治地位作辩护。名为宗教比较,实际上是宗教史,近年来称宗教现象学。后来,由于进化论的传播而有了宗教进化的研究,由于原始宗教知识的丰富而有了宗教起源的研究,由于科学精神的发达而有了客观的宗教比较研究。宗教人类学家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宗教比较,它不致力于评价宗教的优劣,平等地看待古往今来的一切宗教。这种研究超越了对一些权威宗教的崇拜,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多样性和相当的独立性。例如,接近基督教的人并非总是能够摆脱自己在文化和感情上与基督教的联系,但他们对印地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宗教信仰,倒可能会有一种客观的态度。另外,从比较的方法看,发达社会中的宗教有太多的外部装饰,过于复杂的形而上学论证,还有等级分明的僧侣制度,有时这会妨碍我们对宗教本质的认识。而观察质朴社会的宗教,反而可以使我们认真思考宗教的本质或基本原则以及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

(二)受控比较方法

宗教人类学的比较方法有两类,一类是受控比较,一类是跨文化比较。受控比较方法考察的是一些在历史上彼此有联系的社会。这种比较可以局限在一个单一的文化或社团之内,比较双方具有单一的文化背景;或局限在单一的民族之内。如对印地安人不同部落的原始宗教加以比较,又如对中国福建省和台湾省的民间宗教进行比较研究。这种较有局限的比较有长处,共同的文化背景使可比性有保障,被比较的宗教有联系并往往属于一个大整体。此外,宗教的一些量度,如仪式、伦理、神话等,可以从功能上加以研究。前面说到,中国苗族的打棒棒猪的宗教仪式,在美国苗族中演变为打棒棒鼠的宗教仪式,功能上的原因是什么?这就属于受控比较的研究课题。大量晚近的宗教比较都是属于这一类,虽然它的缺陷是眼界较窄,但仍然有许多宗教人类学家运用它。如埃根(eggson)在《社会人类学与受控比较方法》一文中说:“我自己比较喜欢运用小规模比较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对比较的框架做出了尽可能多的有效控制”^[3](第 11-12 页)。

(三)跨文化比较的方法

这一类比较考察的是一些在历史上彼此无关联的社会,常常具有整体论的性质。它可以在一个大陆内进行,又可以在不同的大陆或民族之间进行,也可以随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利用宗教的形式、结构、和过程的相似性作基础,建立一些宗教类型和进化序列。泰勒、弗洛伊德、杜尔凯姆、布朗的工作都属于这一类。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不但要了解一种文化的宗教,还要对不同文化的宗教进行广泛的比较,以寻求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人类学家惠廷在《跨文化的方法》一文中说,认真选择社会的样本,是这种方法成功的关键。有的学者主张将上面两种比较方法结合,如埃文斯·普里查得的《宗教》一书认为,假如我们想要客观地对整个原始宗教的本质得出一般性的有意义的结论,就应当综合使用上面两种方法。以美拉尼西亚人为例,他认为必须首先调查某个部落的宗教,然后与其他几种在文化上与之相近的部落的宗教相比较。此后再对所有美拉尼西亚部落的宗教进行比较研究,还可与其他后进民族的宗教相比较。“只有这时,才

能对美拉尼西亚人的宗教做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3] (第 11 - 12 页)。宗教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很费时也很费力,但可以得出真正有价值的结论。

(四)与比较宗教学的比较

宗教人类学的比较方法与比较宗教学有什么不同吗?英国圣公会牧师布凯特 1942 年出版了《比较宗教》,并因此书享有盛名。此书是将世界各大宗教一一列出,然后研究各自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宗教史著作。由于他的影响,许多人至今以为比较宗教学就是将各大宗教并列,叙述它们各自的发展。目前,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一是两种宗教的比较,先对宗教 A 描述和解释,再对宗教 B 描述和解释,然后比较 AB。秦家懿和孔汉思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金(W. King)的《佛教与基督教》等都属此类。另外一类是宗教某一特征的比较,如铃木的《基督教和佛教的神秘主义》;卡普拉(F. Capra)的《道与物理学》,将中国古代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与西方量子物理学理论进行比较。

以上几例说明,比较宗教学基本上是研究文明社会的制度化宗教,而宗教人类学的比较研究主要针对非制度化宗教,如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等。1958 年,雷萨(W. A. Lesa)和福格特(E. Z. Vogt)合编出版了《比较宗教读本——一种人类学的方法》,此书有十个分类: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宗教在人类社会的功能、符号论、符号的分类、神话、祭祀仪式、萨满教、巫术巫技和占卜、死亡鬼神和祖先崇拜、宗教的动态学。从这十项分类的内容看,宗教人类学的比较对象与比较宗教学的比较对象的确有很大的不同。又因为比较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后者会采用前者很少使用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和受控比较的方法。另外,现代西方宗教人类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即研究本土西方社会的宗教。现代美国社会的宗教是多层次的,有世界宗教,有民族、国家宗教,有新兴宗教和邪教,有黑人和印地安人宗教,对这些不同层次的宗教进行比较研究,是现代美国宗教人类学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文化相对论的方法

(一)文化相对论是人类学的基本观点

首先它是一种文化评价观,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纠正。19 世纪,西方各领域的学者都认为西方文化是人类文化最高峰,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东方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是衰落的文化、低级的文化,它们或者改变,或者消亡。只有人类学家反抗这种看法并提出很有特点的文化相对论。人类学家发现,几乎所有文化都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自己的社会往往命名为“我们人类”,别人的社会往往命名为“你们次人类”。人类学家说,西方文化中心论也不过是这种现象的反映而已。人类学家走遍了五大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发现,每种文化都有适应环境、满足需求、加强团结、稳定社会等功能,都有它的特定价值。强大民族与弱小民族,文明民族与落后民族,它们的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文化。这就是文化相对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学的文化评价观。

通过杂交而形成新品种,是生物进化的一种重要方法。

所以,生物学家珍惜每一种植物和动物品种,不使灭绝,因为它们有独特的基因。文化的进步也要通过杂交,也要珍惜每一种文化基因。西方文化并不是纯种,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也是形成西方近代文明的东方基因。中国的造纸术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发达,中国的指南针使欧洲的航海探险事业发达,才有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美国的一些现代舞,如迪斯科、霹雳舞都吸收了非洲黑人舞蹈的文化基因。某一种原始部落的文化今天看可能是落后的,正濒临灭绝;但是若干代或若干世纪以后,它也许会成为一种新文化的重要基因,甚至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基因。西方殖民者过去已消灭了一批后进种族及其文化,这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

(二)文化相对论是宗教人类学的重要方法

西方人习惯于用西方观念去理解异民族文化,结果对异民族文化往往做出错误的描述和结论。文化相对论主张客观地观察,甚至主张站在被观察者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有时被称为“主位研究法”。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说:“检验主位研究法的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在于那些记述和分析是否符合当地人的世界观,是否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有意义的、恰当的。在进行主位研究法时,人类学者要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有关类别和规律的知识,以便能象当地人那样去思考问题,去行动”^[4] (第 16 页)。根据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每一种宗教都有它特定的价值,都是一种文化的基因,都应当受到尊重。当我们研究一种宗教时,可以采用主位研究法,即假设自己是这种宗教的信徒,如果从信徒的立场和心理去看待这种宗教的教义和仪式,会有怎么样的感受。与主位研究法相对应的是客位研究法。一个宗教的信徒去研究这个宗教,往往会因为崇拜、信仰、偏爱而失去客观性。客位研究法要求研究者不受自身信仰的影响而采取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

(三)宗教多元论

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出发,就会平等地看待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宗教,这也是宗教多元论的基本思想。宗教多元论者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论,认为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核心是基督教中心论。古代基督教认为,它是由上帝的独生子创立的,因此具有优越性。其他宗教或是魔鬼的产物,或是俗人的产物,或是理性的产物,都无法与基督教相比。但是宗教人类学家发现,每种宗教都宣称自己是天启的宗教,是最优越的宗教,这证明世界上没有唯一优越的宗教。我们只能平等地看待各种宗教,没有一种宗教有权超乎其他宗教之上。而且,一个人无论是佛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或者是民间宗教的信徒,对多数人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宗教种族性的问题。如一个人出生在埃及穆斯林家庭,就基本上决定了他一生是穆斯林教徒。出生在印度的印度教家庭的人,就大致决定了他一生是印度教徒。他没有经过选择,而仅仅是因为种族和家庭就信奉了一种宗教,如果他坚持说这种宗教是唯一正确的,是最优越的,显然不能成立。

著名宗教多元论者约翰·希克是基督教神学家,但他并不同意基督教优越论。希克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任教授期间,经常加入穆斯林、印度教徒等其它宗教的活动,他体会到其

它宗教的感受与自己在基督教中的感受是一致的。于是,他发起了“一切信仰属于一体的人类”自愿团体并任第一届主席。他认为近现代的西欧文明与基督教没有必然的联系,基督教没有促进科学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相反却压迫科学和压抑人性。西方文明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古希腊理性探索精神的产物。宗教多元论者提倡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而反对宗教冲突。他们认为,在当今多元世界的时代,每一种宗教都不是“唯一”,将来也不可能“唯一”。但它们都是“多中之一”,都是对神性的终极实在的回应^[5](第 19 页)。

四、动态、综合、辩证的研究方法

(一)对宗教变迁及其动力的动态研究

早期宗教人类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写民族志、宗教志,力图客观地将未开化民族的原始宗教活动一一描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静态的研究。二次大战以后,宗教人类学家开始重视宗教变化、宗教动力、宗教复振运动。英美人类学家研究文化变迁中的宗教运动,如美国印地安人的鬼舞运动和仙人掌教运动、南太平洋群岛土著人的千福年运动或船货运动。美国人类学家华莱士 1956 年写的《复兴运动》是这类研究的典型。他将本土主义运动、船货崇拜、千福年运动等形式都概括为宗教复兴运动,并找出这类运动的共同特征。他认为,大部分宗教现象的历史起源都隐含于这类运动之中。

现代宗教人类学探讨的问题:宗教世界不断世俗化,但为什么世俗化的增加,却又不断产生新的宗教?这涉及到宗教的动力问题。华莱士等人的研究,试图回答这类问题。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是需要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还要求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宗教运动。扎雷斯卡和马克·莱昂 1974 年编辑的《当代美国宗教运动》,对美国的新兴宗教作了广泛考察。1976 年弗朗辛·戴纳的《克里希那的美国儿女:国际克里希那运动的研究》,对一类具体的新兴宗教进行了人类学探讨。1970 年华莱士的《塞尼加族的死亡和再生》一书深化了他在《复兴运动》一文中的宗教动力理论。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运用宗教复振运动的理论研究台湾“新兴民间宗教”以及朝圣进香活动^[6](第 45 页)。香港人类学家乔健研究中国瑶族寻找、返回千家峒居地的运动,认为这一运动属于世界范围的本土运动或宗教复振运动^[7](第 66 页)。

美国人类学家恩伯夫妇合著的《文化的变异》一书中有一节“宗教变迁”,论述“西方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大导致了世界很多地区的宗教变迁”。例如“我们对蒂科皮亚岛居民改信基督教的过程进行考察”^[8](第 557—558 页)。在美洲,大部分印地安人的部落改信了天主教或基督教。在非洲,越来越多的民族改信了伊斯兰教。这些宗教变迁及其动力问题,是当代宗教人类学家进行动态研究的重要对象。

(二)对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西方宗教人类学与西方宗教社会学在二战前有一种无形的分工。宗教人类学只研究未开化民族的部落宗教,它离不开魔力、禁忌、图腾、魔法、萨满教、神话、祭祀等等概念。宗教社会学只研究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历史宗教。这些制度化的宗教与似乎一成不变的部落宗教相比,是有历史发展

形态的,所以称之为历史宗教。在那个时期,人类学的宗教理论似乎不适用于历史宗教,而社会学的宗教理论完全不能去说明部落宗教,难道这两类“宗教”不是一个宗教吗?最近几十年,西方一些学者意识到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例如,英国学者布林·莫利斯在其著作《宗教人类学》序言中说:“我认为,把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因为这将导致人们的视野更狭隘。……在部落宗教(正如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与历史宗教(正如社会学者和有关专家所分析的)之间无形中产生了一种概念性的划分,并且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论论述”^[9](第 3 页)。

当宗教人类学家离开未开化民族而回到西方本土时,他们更加需要综合地研究部落宗教与历史宗教。首先,他们可以研究本土上未开化民族的宗教。例如,美国宗教人类学家可以研究印地安人的宗教。但是,他们肯定会发现情况变了,印地安人的经济文化进步使他们不再是未开化民族了,他们的宗教也融合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某些流派中了。所以,必须采取综合的研究方法。其次,他们还会发现,原始宗教中存在着的巫师、萨满、致幻药、神坛、圣殿、魔力等等,在最发达的民族和国家中,在最繁华的都市里,也同样存在着,需要宗教人类学家去研究。第三,他们学会了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去研究所谓历史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制度化宗教。这些制度化宗教的教义教规与民间教堂庙宇中实际的宗教活动往往有区别,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可以了解到现实形态和民间形态的宗教行为。第四,宗教人类学家善于进行宗教的比较研究,在这个领域里他们可以进行更广泛的综合研究,例如可以将未开化民族的原始宗教与发达国家的民间宗教进行比较研究等等。布林·莫利斯的《宗教人类学》已经是综合研究的尝试。书中所说的“宗教”并不局限于未开化民族的宗教,书中的宗教人类学家也不局限于那些专门研究原始宗教的学者。

(三)对客观与主观方法的辩证把握

宗教人类学一直具有实证科学的特征,强调客观的态度,重视经验的检验。但是本世纪中叶,传统的宗教人类学向哲理化方向转变。特别是 50 年代后期,西方哲学思潮不断更新,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解释学风行一时,各领风骚。宗教人类学受这些哲学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批新的流派。最著名的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图腾观、神话观,其代表作是《神话学》(1964)、《野性的思维》(1962)、《当代图腾制度》(1962)、《结构人类学》(1958)等。利奇和特纳接受象征主义哲学而从事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利奇分析了原始民族割礼仪式和图腾制度的象征意义。特纳则以专门研究宗教仪式的象征意义而著名。格尔茨是解释人类学的创始人,他的《爪哇的宗教》(1960)一书关于“巴厘岛斗鸡”的分析与解释,是他运用解释主义分析宗教现象的典型实例。他的宗教人类学观点集中表述在《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1965)一文中。此外,西方宗教人类学还受到符号学、现象学等哲学流派的影响,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以上这些当代西方思潮,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于“主观性”的重视。例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的心

理意识是最真实的存在。他说:“存在先于本质,或者说,必须以主观性为出发点”^[10](第 555 页)。又如现象学哲学家梅罗·庞蒂认为,人类学家对未开化民族的文化与宗教的理解,实际上处处体现着人类学家自身的主观性。所以,他主张写第一人称的民族志、宗教志,以本人的体验和感受去反思研究对象的认识,并将这种带有主观性的认识作为人类学的民族志、宗教志的重要内容。

人类学家、宗教人类学家对主观性的重视,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呢?黄淑娉教授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这种方法“不是根据客观的科学事实得出研究结果,而是凭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想法作出结论”^[11](第 4 页)。史宗先生对重视主观性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辩证的方法。他说:“对于象征的分析构成一个转折点,它使较传统的人类学中的刻板而‘客观’的观点,转变为比较辩证的观点。这种辩证的观点在考察社会和文化时,尽可能地提醒人类学家和观察者注意到自己的主观性与文化的概念”^[3](第 199 页)。笔者倾向于史宗先生的看法,宗教人类学从重视客观性到重视主观性的转变,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

90 年代,中国大陆已出版了 3 本《宗教人类学》。一本是国内学者张桥贵、陈麟书合著的,由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一本是日本吉田祯吾写的,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翻译出版,一本是英国布赖恩·莫里斯的,1992 年今日中国出版社翻译出版。1995 年,上海三联书店又出版了《20 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下册。这都预示着宗教人类学这门诞生于西方的学科,下个世纪在中国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宗教人类学经历了形成、发展、转向等阶段,它历经危机而没有衰败消亡,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它独特的研究方法。它的传统的研究方法到了现代变得更加丰富和开放,而在新的时代

又能不断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本文对这些方法略加介绍,以期引起学者对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展开探讨和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美]R M 基辛.文化。社会。个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 宫哲兵,黄润勇.苗族打棒棒猪习俗的社会历史透视[J].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3).

[3] [美]史宗. 20 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C].上海:三联书店,1995.

[4] [美]哈里斯.文化人类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5] 王志成.寻求宗教间的新和谐[J].北京:世界宗教文化,1996,(5).

[6] 李亦园.新兴宗教与传统仪式——一个人类学的考察[J].昆明:思想战线,1997,(3).

[7] 乔健.飘泊中的永恒[M].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0.

[8] [美]C 恩伯,M 恩伯.文化的变异[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9] [英]布林·莫利斯.宗教人类学[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10]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1]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严 真)

Modern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Approaches

GONG Zhe-bing

(School of Humanities,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Biography GONG Zhe-bing (1949-),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religion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unique research approaches in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such as investigation in the fiel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comparative study and cultural relativity.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approaches have got improved and refreshed in the enlarged researching fields arter world War II . Some new are approaches adopted to deal with the new objects of study. In them, there ré dynamistic research on the changing-for-the-second time and it s dri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and the dialectical synthesis of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methods, etc.

Key words religious study; anthropology; research approach